

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研究——以佛道玺印为重点

A Study on Imperial Seals of Shoushan Stone in Ming Dynasty: Focusing on
Buddhist and Taoist Seals

董胤

Dong Yin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内容提要: 寿山石作为中国四大名石之一,使用的历史已逾千年,至明末清初时受到世人重视,并深刻影响了篆刻及石雕艺术的发展。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寿山石玺印是明代帝后宝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研究寿山石文化发展脉络及明代寿山石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寿山石与明代帝后玺印关系、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钮饰研究及明代帝后寿山石玺印与皇室佛道信仰三个方面对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种类、特点、材质及雕刻等内容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对其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并引发当下寿山石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思考。

关键词: 寿山石 玺印 篆刻 道教 佛教 钮饰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famous stones in China, Shoushan stone has been use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It was highly valued by the world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deep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eal cutting and stone carving art. The Ming Dynasty Shoushan stone seal collec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ing Dynasty imperial and empress seal, and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u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Shoushan stone culture and Ming Dynasty Shoushan stone culture. This article sorts out and studies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materials, and carvings of Shoushan stone seals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ushan stone seals and Ming Dynasty imperial seals, the study of Ming Dynasty imperial Shoushan stone seal button decor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g Dynasty imperial seals and royal Buddhist belief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m and trigger new thinking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houshan stone culture at present.

Key Words: Shoushan stone; seal; seal cutting; Taoism; Buddhism; button decoration

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石有着浓厚兴趣，藏石、赏石、玩石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福州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采集寿山石制作石器，南北朝墓葬出土的寿山石猪被视为寿山石雕的发端。虽然早在《宋会要辑稿》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已经记录寿山石进入宫廷为帝王所御用^[1]，但是直到元、明时期才随着文人篆刻被引入印章石领域，并由此生发出经久不衰的寿山石文化。除篆刻外，寿山石钮饰艺术也在明代时取得长足进步，雕刻艺人在汲取前代玺印钮饰的基础上创造出风格独特的印钮艺术，为后世寿山石钮饰艺术的发展和雕刻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目前已知成系统的有关明代寿山石篆刻与钮饰实物资料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帝后寿山石玺印为最，从中可以窥见寿山石在明代已经作为皇室玺印的主要材质之一，为研究明代皇室信仰与寿山石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参考。当下对于寿山石印章的研究大都“厚清薄明”，多数情况下石材只是作为篆刻的附属而少有提及，面对寿山石的具体品类、钮饰风格等也并未结合篆刻内容进行综合讨论，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专题研究尚待拓宽边界。当然，因年代久远石材种类辨认难度大、当时篆刻署款不普及也是影响研究不可忽视的因素。目前关于明代帝后玺印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故宫经典：明清帝后宝玺》，郭福祥著《明清帝后玺印》，以及恽丽梅著《明清帝后宝玺》等。本文将所见著录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作初步归纳整理分析，抛砖引玉，希望能给广大学者提供研究参考。囿于笔者见闻，难免有所疏漏讹误，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寿山石与明代帝后玺印

中国印章所用材质经历了从金属向竹木牙石的转变，寿山石因其种类丰富，色彩千变万化，刀感柔而易攻，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文人雅士皆爱之宝之。明代早期石质印材并未广泛使用，成化年间叶蜡石和花乳石被宫廷采用，故宫现存明代帝后宝玺虽然有所破损，但仍可识别出确为叶蜡石、花乳石及滑石等不同种类^[2]。目前公开出版物中可见诸多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实物，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中收录了明代帝后宝玺65方，其中寿山石质占37方，占总数一半以上，足以证明寿山石已成为明帝制玺的重要材料^[3]。

依据《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中对玺印用途的分类，明代帝后宝玺中寿山石国宝有“皇帝之宝”“御前之宝”（印1）；御书钤印诸玺中寿山石宫殿名玺有“文华殿宝”“清宁宫图书”“乾清宫封记”（印2）；寿山石赞颂天道勤求治理祝语玺有“文德武功”（印3，图1）“丹符验记”“天潢演派”“亲贤保国”“协和万邦”“万国来朝”“圣经贤传五车余”“宝藏”“肃清精密”（印4）“主静制动道德日新”“至治熙和宇宙清”“善及四方御押”“双龙捧寿（图形玺）”“六合归仁（图形玺）”（印5）“羚羊（图形玺）”“万里江山（图形玺）”；寿山石道篆青词钤用诸玺及佛菩萨图形有“玄谷帝君道宝”“玄谷帝君金丹之玺”（印6）“玄都万寿之宝”“紫极真仙之宝”“混元先天、一气教主、苍空真老、玄谷帝君”“阴阳无始、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铅汞结丹砂、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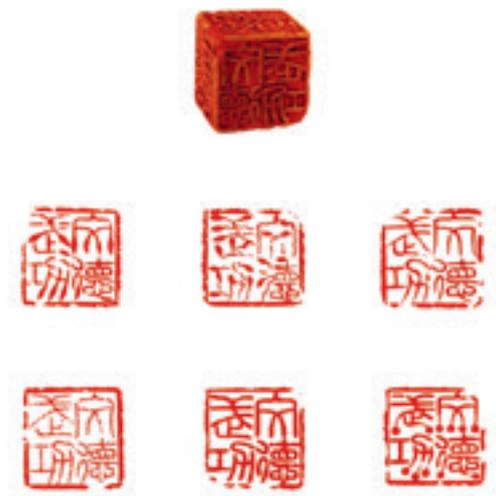


图1 文德武功六面同文玺

耿紫金色”“丹月生光彩”“丹在身中御押”“阿弥陀佛（图形玺）”“不动佛（图形玺）”“弥勒菩萨（图形玺）”“因揭陀尊者（图形玺）”“持国天王（图形玺）”“白衣母（图形玺）”“除灾金刚（图形玺）”“摩尼宝珠（图形玺）”。而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可以从印文内容中反映出皇室的宗教信仰，二是这些寿山石玺印大部分都保留有不同钮饰，为我们研究明代寿山石印钮雕刻提供了实物资料。

二、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钮饰刍议

明人治印传世相对较少，我们很难从零星的材料中对其钮饰风格进行系统研究。但从近年新出土明代文人印章的钮制来看，印钮不仅雕工精细，有些更是形神兼备，尤其如龟钮、瓦钮等仿古印钮的形制更是与古玺印造型十分吻合，这也和明代文人的仿古风尚趋于统一。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可见的明代宝玺不仅大部分雕刻有印钮，题材更是广泛，包括神兽类、动物类、人物类、植物类、图案类等。皇室玺印与民间印章钮饰共同体现出此时印钮雕刻技艺十分成熟、审美取向已经明确，其于仿古之中创新，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印钮雕刻。

明代晚期印石的数量远超实用需求十分明确，在文人的参与下，印章成为书画艺术的重要构成，经历了从强调实用性向追求艺术性的转变，审美价值不断被强调。清代高兆《观石录》中记：“潘子和、谢奕，砚工高手，攻石能得其理。好事家获石既夥，二人益自矜，以礼延致，不可卒至，或造庐焉，映门

一诺，童子负器先驱矣。每解一石，摩肩围绕，心目共注，幸得妙品，博观闺阁，交手喜妒。”^[4]因明人制钮少有落款，故使我们很难详细知晓当时这两位制作者的风格和特点。印章雕刻装饰一般可在印钮、印台、印边、印体四个部分施工，印台又分为平台、自然台、覆斗台等式样，对比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帝后寿山石玺印，目前所见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印台均为平台，印边无装饰。此外，在对石材天然颜色和纹理的驾驭上，清代帝后寿山石玺印对于石材俏色的利用十分讲究，而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石材颜色单一，也几乎看不到对石材颜色取巧雕刻的处理手法，也未见薄意雕刻技法。在钮饰风格方面，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雕刻以古朴生动为主要特点，块面几何感强，运刀劲健洒脱，单刀成型与琢磨参用，技法上有圆雕、浮雕和深刀雕，线条精练而少作繁缛炫技的镂空和开丝雕饰，尾部及须发偶作开丝处理，亦能“连而不断，繁而不乱”，各种雕刻元素的整理归纳使观感上有一种含蓄内敛的气质。这种在造型上避免过于复杂和零碎的处理手法，与晚明时代文人尊崇秦汉古玺印，及其古拙朴茂的审美情趣相一致。在一些民间晚明兽钮工艺中也有突目开瞳的装饰手法，眼珠上凸如蟹，双目点睛以凝神，但此类装饰手法在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中未见。虽然这些玺印的钮饰风格整体以朴拙为主，但须发开丝和突目开瞳等装饰技法的使用表明已经开始走向精巧。除雕刻技法本身外，磨光和推光技术也开始得到重视。

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中最具特点的是有部分钮雕与印文内容相互呼应。如“至治熙和宇宙清”人物钮方形玺（印7，图2），篆书七言诗一首，其中两句为“奇珍异宝形庭贡，一统江山属大明”。钮雕虽有些许破损，但依然可辨一番人形象身负一袋弯腰俯首将袋内物品倾倒而出。“圣经贤传五车余”人物钮方形玺（印8），篆书七言诗：“圣经贤传五车余，治世安民赖此书。收拾腹中闲坦坐，一轮红日在空虚。”钮雕一袒胸露脐形似大肚弥勒的长者倚书而坐。“玄都万寿之宝”人物钮正方形玺（印9），玺背高浮雕三老立于祥云之上，三者皆有背光，应为道教三清形象，三清为三位尊神的合称，指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玄都”是道家所称神仙居所，指泥丸宫，又名“天宫”^[5]。此玺应是祈求得道成仙，寿延万年之意。“协和万邦”象钮方形玺（印10，图3），钮雕一头大象前肢伏地，玺文出自《尚书》：“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6]提出先由家族和睦，扩展到社会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万邦诸侯。大象

敦厚稳重，象取吉祥谐音，象钮上半部分有明显断痕，原本可能雕刻有宝瓶，寓意太平有象。另有“善及四方”云钮方形玺（印11，图4），钮雕祥云一朵。“羚羊”瑞兽钮正方形玺（印12），钮雕似羊瑞兽回首卧坐。以上这些钮雕与印文内容相呼应的玺印应是工匠根据篆刻内容奉旨雕刻，也不排除篆刻之后补雕印钮的可能。

螭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作为纹饰发端于春秋时期，战国时已经成形，到汉代发展至最高峰，在宋以后一直流行至今。在古代玺印中，螭钮自秦汉始，就是皇帝、皇后的专用钮式，以示皇权尊贵威严，《史记集解》引蔡邕言：“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钮。”^[7]从雕刻层面上来说，螭本身是一种装饰性极强的题材，其身躯狭长，盘曲或伸展皆可，能够适应形态、俏色不同的各类石材，因此在玺印中出现频率较高。在文中涉及的37方明代帝后寿山石玺印中，雕刻螭钮最多，有“不动佛（图形玺）”“持国天王（图形玺）”“除灾金刚（图形玺）”“丹符验记”（印13）“丹月生光彩”（印14）“弥勒菩萨（图形玺）”“摩尼宝珠（图形玺）”“万国来朝”（印15）“御前之宝”“主静制动道德日新”（印16）共计10方，形态或蹲或盘。大部分螭钮都是身体形态向一侧扭动较大，头部一般放置在前肢或躯干之上，四肢居于印台四角，尾部从后腿一侧穿出，工艺干净利落无多余修饰，动态感强，与战汉到明清玉印上的螭钮属于同类风格。龚纶在《寿山石谱》中记：“显杨之制精工，而周所作朴茂，取径不同。”^[8]对比作品传世相对较多、活跃于清初的杨玉璇和周尚均二人的螭钮



图2 “至治熙和宇宙清”诗玺



图3 协和万邦象钮方形玺



图4 善及四方御押云钮方形玺



风格不难发现，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螭钮与战汉以来玉印螭钮的风格相同，以灵动流畅为宗旨，这样更能与玉石坚硬的材质互补。寿山石材质硬度远不及玉，柔而易攻，更易于工匠施展，因此虽然清代螭钮在布局上同战汉以来玉印螭钮布局并无不同，但螭的形态则一改战汉以来的轻灵取向，变为敦厚扎实，头部比例明显增大，螭的动态变轻巧为平稳，细节刻画趋于繁复。综上所述，通过对故宫博物院现存明代寿山石玺印的钮式、形制、工艺等综合分析，可判定其制作年代仅少数为明早中期，大部分应属于明晚期。

三、明代帝后寿山石玺印与皇室佛道信仰

（一）佛教玺印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明代佛教印40余方，原藏内务府，多为晚明时期之印。有一部分为佛教词语印，一部分为佛教图像印。在印章上大规模地镌刻佛像是少见，为宫廷皇帝首创。这套印章为何刻制，是否钤印于佛经之上，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印面有使用和磨损痕迹。明代皇室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藏传佛教至明代在西藏地区已经教派林立，各教派不仅与地方封建势力保持紧密联系，在财政上，更是有寺院经济作为支撑。根据对西藏实际情况的了解，永乐时期改元代“独尊萨迦”，转而采取了“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使西藏各派相互制约，强化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管理。如宫廷佛教图像印，就有西藏佛像和汉地佛像两种。在明代宫廷艺术与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相互影响下，一部分藏传佛教形象受到汉风较多

影响，也有汉传佛教形象受到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影响的痕迹。

图像印也称肖形印，兴盛于两汉之际，现今作品多为汉代遗存，汉以后至元以前所见不多，元、明、清时期图像印亦不多见。图像印属于闲章的一种，有纯图像和图文并茂两类，在功用上主要有征信、敬神辟邪、佩戴取玩三种。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9]中收录了8方寿山石佛教图像印，佛像印有：“阿弥陀佛（图形玺）”“不动佛（图形玺）”；菩萨像印有：“弥勒菩萨（图形玺）”；祖师像印有：“因竭陀尊者（图形玺）”；护法神像印有：“持国天王（图形玺）”“除灾金刚（图形玺）”；佛母像印有：“白衣母（图形玺）”；法器印有：“摩尼宝珠（图形玺）”。佛教与寿山石的渊源由来已久，如一些矿洞和石种就被命名为“寺坪石”“和尚洞”“尼姑楼”“无头佛”等与佛教有关的名称，如其中“寺坪石”的得名就与一座寺庙有关。《三山志》记：“寿山广应院，稷下里，三年（光启三年）置。开山僧号妙觉。龙纪元年改今额。”^[10]《八闽通志》记载：“寿山广应院，唐光启三年建。”^[11]《三山志》中记载广应院时还特别提到了“寿山石，洁净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盖珉类也。五花石坑，相距十数里，红者，髹者，缃者，紫者，惟艾绿者难得。”^[10]广应院建成后曾遭焚毁，明末徐爌《游寿山寺》：“宝界消沉不记春，禅灯无焰老僧贫。草侵故址抛残础，雨洗空山拾断珉。龙象尚存诸佛地，鸡豚偏得数家邻。万峰深处经行少，信宿来游有几人。”^[12]诗中所言“断珉”应该即指广应院中原本收藏的寿山石被火烧之后。

陈子奋《寿山印石小志》记：“相传寺僧藏石甚富，明崇祯间寺废，石没土中，近石农于其寺址掘得者，呼为寺坪石，皆三百年前旧物也。”^[13]虽然寿山石在颜色上“缺蓝少绿”，但是其实黑色石种也仅有寺坪石、吊笕石、坑头牛角冻石、尼姑楼石等几个品种，而除寺坪石以外的石种开采年代均远晚于明末清初，所以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中收录的黑寿山石玺印极有可能就是寺坪石。

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中收录的寿山石佛教图像印及其他石材佛教图像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图像印一般篆刻较为简约，多采用阴文，而明代宫廷佛教印篆刻图像不仅为阳文且较为复杂，细致地呈现出法器、佩饰、手印等细节，使我们更易于通过图像进行形象辨认，究其原因与明代统治者尊崇佛教密不可分，这一点我们从明代后妃的佛教信仰中可以一窥端倪。明代后妃信佛是一种普遍现象，她们有的“垂法宫闱”，有的施金修建寺庙，有的与高僧结缘，有的则刊印佛经。其中，仁孝徐皇后、慈圣李太后、神宗王皇后和郑贵妃都有过刊印佛经的活动^[14]。在皇室推动下的官刻佛教典籍、佛经刊印得到重视，版画插图刊刻随之繁复庄严，整体上促使明代佛教典籍的雕版插图得到空前进步，佛像印应该正是受到官刻版画插图的影响而变得复杂细致。第二，这些佛教图像印在印面布局上多数采用了中心构图法^[15]。第三，佛教图像题材选取上特别是藏传佛教图像题材上多选择各教派共同供奉的神祇形象入印。藏传佛教神祇体系庞杂，虽然各教派所崇奉的神祇各不相同，但均共同供奉的如不动佛、五方佛、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造像题材在此都有涉及。

下面逐一介绍印面图像内容。

阿弥陀佛印。“阿弥陀佛”为双羊钮方形玺（印17）。阿弥陀佛也称无量寿佛、无边光佛，密宗称为甘露王。净土宗的主要信仰对象，被称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佛教宣称只要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消除一切罪恶转生至西方净土中，故称为“接引佛”。这种信仰迎合了普罗大众安身立命的观念，使人们口称阿弥陀佛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行为。信仰西方净土，一心以阿弥陀佛为教主即可“顿超三界”，根据往生时品级不同而渐次成佛。

不动佛印。“不动佛”为盘螭钮方形玺（印18），边款“不动佛”。不动佛属金刚部，又称不动如来、阿閼如来，为五方佛之一。对于不动佛的信仰，最早体现在唐不空译《阿閼如来念诵供养法》^[16]。不动佛在藏传佛教中属于较为常见的佛

像类型,图像学特征是结跏趺坐于莲座上,一手持禅定印,一手施触地印,通常佛的双脚前置金刚杵。这一姿态佛像的图像学含义表示佛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以指触地,以示降伏魔众令大地为证。

弥勒菩萨印。“弥勒菩萨”为盘螭钮方形玺(印19),边款“弥勒菩萨”。菩萨形的弥勒造像取材于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姿态,着菩萨装,两脚交叉或结半跏趺坐,一般单独供养;如来形的弥勒像表现了弥勒下生成佛的形态,为三世佛中的未来佛。此印面图像即为菩萨形,虽然主尊头部已经残损,但其身着菩萨装,右下方一狮首回望主尊听法的造型也为我们判定图像提供了参考依据。狮子是弥勒菩萨的护法神兽之一,早在犍陀罗时代的造像中就出现有弥勒菩萨坐在狮子上的形象。

因揭陀尊者印。“因揭陀尊者”为卧兽钮方形玺(印20)。印面图像中尊者身披袈裟,有头光,左手持经书,右手捻念珠。此尊者为十六罗汉之一,唐代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记载,第十三尊者名因揭陀,“与自眷属千三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广胁山中”^[17]。有关因揭陀尊者的图像特征,在《尊者礼供和仪轨略摄》中规定了藏地罗汉的座次、名号、居地、眷属和图像特征,其中因揭陀尊者手持香钵和拂子。自此罗汉的执物或印契等图像特征固定下来,直到如今少有变化,让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辨认出每位罗汉的身份^[18]。

持国天王印。“持国天王”为盘螭钮方形玺(印21),边款“持国天王”。持国天王为佛教护法神,居于须弥山东面,为四大天王之一,通常和

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成组出现。图像学特点为武士形象,头戴战盔,身着铠甲战裙,手执琵琶、弓矢、稍等不同持物^[19]。

除灾金刚印。“除灾金刚”为盘螭钮方形玺(印22),边款“除灾金刚”。除灾金刚又称定厄金刚,为八金刚之一,乃释迦佛随身侍卫。在《金刚经》信仰流传过程中,八金刚逐渐单独抽离出,成为一组金刚护法神,主八种不同功德,为唐宋以来汉地佛教信众供养崇拜的重要神祇。关于除灾金刚形象的文献记录,在敦煌文献BD02074《金刚峻经金刚顶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九种坛法经作用威仪法则大毗卢遮那佛金刚心地法门密法界坛法仪则》言:“次安水陆灯坛八大金刚、四大菩萨名字并及身色、座位之处。东门二大金刚,第一尊名青除灾金刚,身白色,三面四臂。左羽安腰侧,右羽执于轮;左羽执于杵,应在耳边,右执叉番;二足踏于轮,是名除灾印。”^[20]文中“除灾金刚”印面图像为一面二臂,非忿怒明王形象。

白衣母印。“白衣母”为盘龙钮方形玺(印23),边款“白衣母”。白衣母也称白衣佛母,密宗称其为莲花部阿弥陀佛之明妃,身着白衣,常处白莲中。其图像学特征为头戴五叶宝冠,身着天衣、裳裙,装饰有璎珞、腕钏、臂钏等,一手结禅定印,一手持贲巴壶,结跏趺坐于莲台。

摩尼宝珠印。“摩尼宝珠”为蹲螭钮方形玺(印24),应是上述公开出版物中所见唯一以佛教法器图形入印的玺印。《山堂肆考》记:“佛珠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圆明,清静不染秽污也,故唐诗‘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21]摩尼宝珠古代译为如意珠,佛经及文献中对于如意珠有诸多记载。《法华经》曰:“净如宝珠,以求佛道。”《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曰:“心性宝性无有染污。”《智度论》卷五十九曰:“如意珠能除四百四病。”^[23]本文所涉及的寿山石“摩尼宝珠”图形玺印面虽有残破,但依然可以辨认出图像为双龙拱卫一圆珠,圆珠中心清晰可见“摩尼宝珠”四字篆书。

除上述之外,恽丽梅著《明清帝后宝玺》较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多收录了7方寿山石材质的佛教用语印,分别为寿山石卧虎钮“大藏光明”印、寿山石螭钮“大乘法宝”印、寿山石“法轮常转”印、寿山石弥勒像钮“一尘不染,顿悟真空”印、寿山石“寸心不动,一法无为”印、寿山石“禅机、妙旨”二面印、寿山石“顿悟圆通、究明玄旨”二面印^{[9]34-47}。

（二）道教玺印

故宫博物院收藏明代印约600方，御书钤用印占很大比例，其中有关道教印约占三分之一^[23]。在中国古代印章中，道教印占有一席之地。王育成先生将其分为四类：第一是国家政权设立任命的道教事务机关和道官所用官印；第二是朝廷封赐给道教首领、重要人物的封号印及各种道阶的等级印章；第三是道教内部各门派的主持人依传统尊号或社会公认的名号所制作的各种印章；第四是道教人物或各道教组织依道书、道经与尊神名目，刻制各种施法时使用的印、章、玺、宝，此类中的个别印章也有由朝廷颁给的^[24]。故宫博物院藏名号道号等印多为寿山石^[23]^[25]，道教闲章中也能见到寿山石材质。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收录故宫博物院所藏寿山石道篆青词钤用诸玺实物共8方，其中名号印有“玄谷帝君道宝”“混元先天、一气教主、苍空真老、玄谷帝君”“紫极真仙之宝”；藏书藏经印有“玄谷帝君金丹之玺”“玄都万寿之宝”；炼丹诗句印有“阴阳无始、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铅汞结丹砂、耿耿紫金色”“丹在身中御押”；赞颂天道祝语印有：“丹月生光彩”^[9]^[23-33]。

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一直作为道教的核心内容和最高追求。在道教理论方面，明代道教较过去有所发展的是内丹学。如正一派天师张宇初吸收佛教禅宗心性学和全真道的性命学，提倡性命双修，强调以炼丹为本，改变了正一道不重内丹而重斋醮、符篆的传统^[25]。皇帝富有四海，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明代皇帝更有纵欲过度身体欠佳者，在延年益寿和永久掌权思想的催动下，自

然沉溺于道教方术中寻求答案。如“阴阳无始、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铅汞结丹砂、耿耿紫金色”（印25）“丹在身中御押”等玺印均为帝王修炼丹法、炼制丹药以求长生的实证。

“阴阳无始”出自北宋程颐《易说·系辞》：“道者，一阴一阳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26]“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铅汞结丹砂、耿耿紫金色”四句见于明代涵蟾子所编道教密炼经典《诸真玄奥集成》中《金丹四百字解》^[27]。而“丹在身中御押”（印26）则较为特殊，属于道教心印形式的花押印，押文内容大都难以辨认。其作用是钤印在蘸录上章等类文书上，押文上面的“一”字为心字，下面的“押”字则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安排，彼此不通^[28]，同类还有“善及四方御押”等。

明代帝后玺印区别于清代帝后玺印的最明显之处，即印文中有大量体现皇室佛道信仰的内容。明代，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与融合中发展。道教和佛教都随着宋明理学显学地位的确立而逐渐式微，佛道两教均依附于皇权，逐渐向儒家靠拢。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的经历使其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在建国之初就认识到佛教与道教一样，对于巩固政权和安定民心必不可少。明代皇室宗教信仰为佛、道两教兼而有之，这在寿山石玺印上可以得到印证。帝王的个人宗教信仰也可从宗教政策上发现端倪。基于佛教的教化功能，明皇室对佛教采取了推崇和扶持的态度。永乐皇帝意图通过佛教为其夺权篡位正名，尤其致力于加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对藏传佛教领袖超乎寻常的推崇，接受了密法灌顶^[29]，藏传佛教在明宫廷影响迅速扩大。明代中期开始，统治者对藏密颇为热衷，佛教更是在护国佑民的加持下日益隆显，耗费了大量国力去兴建寺院和举行佛事活动，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晚明皇室依旧崇信佛教，佛教虽兴但国运日衰。

终明一代，皇室对道教始终尊崇有加，早在洪武和永乐时期就制定和完善了道教的管理制度。从正统后期开始出现过分崇道的现象，对道教管理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于道士身份可以花钱购买导致道士数量急剧增加，此后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几朝也都有过分崇道的现象。成化时期被称为“僧道俱幸”的时代，所谓的僧道方士都是向皇帝进献丹药和房中术而得到政治上的特别重用和获得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的^[30]。此时的传升制使得道士得以进入官僚体系，朝官升迁制度和僧道官制度被破坏殆尽，国家负担加重的同时行政效率也大打折扣，对国家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崇道行为在嘉靖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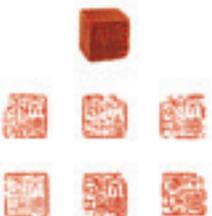
其统治后期更是以崇道为中心。当然，嘉靖的狂热崇道并非出于政治需要，而是来自对道教方术的迷信，以图神仙赐福，寻求长生不死之道，以至于“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31]，因此斋醮祭祀更是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纵观明代道士参政，统治者的决策受到道士的左右，使得政治更加复杂，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帝后宝玺》中共收录16方与明代皇室佛道信仰有关的寿山石玺印。信仰的具体内容在寿山石玺印中都得到直接反映，这些与宗教活动相关的实物对印证明代皇室佛道信仰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寿山石印钮雕刻方面，虽然明代寿山石的质色远不如清代至今的质佳色艳，但是其钮饰题材广泛，雕刻技法全面，延伸了寿山石雕刻美学的范围。相较于宋代以前的石猪、石俑等墓葬明器和佛珠、香炉等实用器，明代寿山石发展成为篆刻艺术的重要载体，并在文人的参与中从印石文化里积淀出深沉的寿山石文化。

参考文献

- [1] 方宗珪. 寿山石知识百讲[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 196-197.
- [2] 徐启宪, 李文善, 郭福祥. 明清帝后宝玺[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8: 19.
- [3] 方宗珪. 寿山石全书[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 113.
- [4] 高兆. 观石录[M]. 清借月山房汇抄本.
- [5] 胡孚琛. 中华道教大辞典[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168.
- [6] 尚书[M]. 王世舜, 王翠叶,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228.
- [8] 桑行之, 等. 说石[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3: 732.
- [9] 恽丽梅. 明清帝后宝玺[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20: 34-47.
- [10] 梁克家. 三山志[M]. 陈叔侗, 校注.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
- [11] 黄仲昭. 八闽通志[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 [12] 陈庆元, 陈炜. 鼇峰集[M]. 扬州: 广陵书社, 2012.
- [13] 陈子奋. 寿山印石小志[M]. 陈清狂, 修订. 福州: 福州书画社, 1980: 45-46.
- [14] 肖晴. 明代后妃刊印佛经论略[J]. 五台山研究, 2017(3): 36-40.
- [15] 李砺. 浅论佛像印的形成及其发展[C] // 2016长沙书法年鉴, 2016: 52-65.
- [16] 李翎. 西夏施触地印佛像小考[J]. 西夏学, 2010(1): 221.
- [17] 释道世. 法苑珠林校注[M]. 周叔迦, 苏晋仁,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8] 张长虹. 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合: 汉藏罗汉名号与座次考[J]. 中华文化论坛, 2020(6): 34-36.
- [19] 李淑敏. 四天王组像及其持物类型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45-55.
- [20] 王航. 敦煌密教鬼神信仰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73-74.
- [21] 彭大翼. 山堂肆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2] 王恒. 云冈石窟[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83-88.
- [23] 恽丽梅. 紫禁城藏明代道教印探微[J]. 中国道教, 2010(3): 23.
- [24] 王育成. 中国古代道教法印研究[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3(2): 61-71.
- [25] 胡友平. 明代道教发展及其政治背景[J]. 考试周刊, 2008(25): 232-233.
- [26] 程颐. 程氏经说[M]. 卷一: 易说.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7] 涵蟾子. 诸真玄奥集成[M]. 卷一. 明万历刻道书全集本.
- [28] 郭福祥. 明清帝后玺印[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58.
- [29] 才让. 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J]. 西藏研究, 2005(4): 33-40.
- [30] 王熹. 明宪宗与道教方士[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2(1): 17.
- [31] 张廷玉, 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896.

附表 明代皇室寿山石玺印

印编号	名称	图片	印编号	名称	图片
1	御前之宝		8	圣经贤传五车余	
2	乾清宫封记		9	玄都万寿之宝	
3	文德武功		10	协和万邦	
4	肃清精密		11	善及四方	
5	六合归仁		12	羚羊	
6	玄谷帝君金丹之玺		13	丹符验记	
7	至治熙和宇宙清		14	丹月生光彩	

续

印编号	名称	图片	印编号	名称	图片
15	万国来朝		21	持国天王	
16	主静制动道德日新		22	除灾金刚	
17	阿弥陀佛		23	白衣母	
18	不动佛		24	摩尼宝珠	
19	弥勒菩萨		25	阴阳无始、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铅汞结丹砂、耿耿紫金色	
20	因揭陀尊者		26	丹在身中御押	